

女性社会价值评价与性别问题

——以“谁是日本社会的女性人生赢家”为例

刘 畅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8)

摘 要: 文章通过以“谁是日本社会女性的人生赢家”为议题分析了现代日本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评价标准。日本社会对成功女性的评价存在“家庭角色(妻子、母亲)+ α ”这样一个模式。文中对该模式的形成及其反映的女性性别问题进行了具体的阐释。日本社会对女性“赢家”的评价表明了家庭角色实现是女性成功的首要条件,其次才是女性社会性贡献及价值的内容。

关键词: 女性社会价值; 日本女性; “赢家”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2458(2016)05-0041-07

DOI: 10.14156/j.cnki.rbwtj.2016.05.006

2003年日本学者酒井顺子曾在《败犬哀嚎》一文中写到:无论人长的多漂亮、如何能干,如果到了30岁还是未婚无子的状态便可谓“女人中的败犬”^[1]。酒井的《败犬哀嚎》一书在当时日本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成为最畅销的图书之一。继而,在2004年“败犬”一词获评为日本年度流行语大奖^①。“败犬”作为一个负面表达的词语,在日本多用于女性^[2]。2006年,“赢家”“输家”等新词语获评为日本年度的流行语大奖。自此,“赢家”“输家”这两个词语在日本社会被更加广泛使用。这一对词语最基本的意思是指,人在事业或财富等方面达到的很好或很不好的状况。另外这一对词语也体现了当今日本社会贫富差距的两极化现象,尤其对于“输家”而言改变其自身处境的可能性很小。在日本社会,“赢家”“输家”的表达方式最初主要用于男性,但是近年来对于女性也开始使用,

并且越来越普遍。

酒井的观点之所以在日本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原因在于其观点迎合了日本传统文化对女性的评价,即女性应以“婚姻、育儿”为重^[3]。虽然酒井的观点看似赤裸又武断,但对于当今正挣扎于是否要走出家庭寻求个性独立的日本女性来说似乎是一个正当时的回应。可以说,对于现代日本女性来说,工作与家庭依然是对立的关系,放弃工作选择家庭依然是日本女性处理之间矛盾的倾向做法。与此相比,在当今中国社会,大多数女性要面临工作与家庭“兼顾”的压力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可是绝大多数中国女性不可能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做出单一的选择。两国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对女性的Life Course产生非常不同的影响。

众所周知,日本的高等教育普及率很高,例如2007年日本高等教育男女的升学率分别为96.1%

收稿日期: 2016-03-21

作者简介: 刘 畅 (1979—), 女, 内蒙古赤峰人, 博士,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河海大学MSW教育中心讲师, 主要从事社会学研究。

① 流行语(新语)是指在当年度被使用的词语中,简单、巧妙的反映社会现象,成为很多人谈论的话题的词语。在日本,每年会举行一次流行语大奖,来表彰最初使用(或引发使用)这些词语的个人或团体。

和 96.6%，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甚至略高于男性^①。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日本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妇人”的称呼不复存在，“女性”成为普遍的说法^②；1999 年 6 月 23 日公布实施了男女共同参与基本法；近几年“男女共同参与”的政策不断推出。值得一提的是现任总理安倍晋三上台以来多次强调推动日本女性就业，同时增加管理层女性所占比例，并在内阁成员中一次提拔了 5 名女性官员，安倍总理自称上任以来任用女性内阁官员的人数为日本史上最多。尽管如此，2014 年仍有 60% 的女性以结婚或育儿为由辞掉工作成为家庭主妇^③。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了日本女性在家庭与工作之间做出这样的抉择？日本社会是如何对女性的价值进行评价的？本文旨在通过谁是日本社会女性的人生“赢家”这样一个议题分析以上问题的原由。

一、日本女性的价值评价标准

在传统的日本文化里男权色彩非常浓重，女性要服从于男性，照顾家庭、养育子女、抚养老人等则成为日本女性最重要的角色^[4]。现代日本社会及女性自身在逐渐脱离传统束缚的同时，仍然保留了对传统女性价值的认同。一些女性同男性一样在各行各业从事工作，其中不乏在事业上崭露头角的成功者。不过，能够同男性一样持续在职场工作的女性却是少数。1987 年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第 9 次出生动向基本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单身女性的理想是成为专职主妇，也就是以结婚、生育、育儿为由放弃工作成为专职主妇。可以说大多数日本女性的自我价值实现是属家庭的，这便导致日本女性的 Life

Course 基本相同，成功女性的标准一般是成为好妻子、好母亲等家庭角色。

到了 2003 年（第 12 次出生动向基本调查），想成为专职主妇的单身女性开始减少，希望工作与家庭兼顾或完成重要家庭任务后再就业的女性在增多，其中希望完成重要家庭任务后（多数为子女上中学以后）再就业的女性所占比例最大。正是这一变化的产生，使得“女性应如何在家庭与工作之间取舍”成为日本社会、家庭及女性自身面临的问题。清水所谓 30 岁以上、未婚无子，便可谓“女人中的败犬”的说法就是反映了当时一部分人的观点。即否定女性选择事业而延误结婚、生子等家庭角色的实现。现在，日本社会舆论普遍开始认可女性在社会职业上的价值，但是对成功女性的评价仍然无法摆脱家庭角色实现这一前提条件。

“赢家”的说法在日本社会生活中经常被用于评价女性，其评价一般不仅仅指哪个人在某一方面获得成功或成就，还有“不但，而且”的语义在其中。比如某女是 XX 会社高管，她还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这种情况下称其为人生赢家再恰当不过。如果把“XX 会社高管”换做其它成就的内容也是成立的，但是如果把“家庭”去掉的话，“人生赢家”的美誉是绝对与之无缘的。比如日本社会所认可的女性“赢家”中还包括这样一群专职主妇，如在日本著名杂志《VERY》^④上刊登的那些专职主妇，她们在照顾家庭之余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艺、技能，有的经济收益不菲，有的获得广泛的社会赞誉。所以，笔者认为日本社会评价女性社会价值存在这样一个次序，即家庭角色（妻子、母亲）+ α >家庭角色（妻子、母亲）> α ，其中 α 可以是包括工作业绩在内的任何除家庭角色之外的其它社

① 2008 年版日本内阁府 [男女共同参与白皮书] 第 6 章教育·研究领域男女共同参与状况。

② 根据日本女性学习财团的解释，“妇人”改为“女性”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妇人”一般指已婚女性，在看待女性问题的时候不具有概括性；第二个理由是“妇”字日语写法为“婦”，右边的偏旁“帚”有扫帚之意，存在对女性的偏见。从 1990 年开始，除了法律条文等不便马上修改的官方文书外，所有“妇人”的表述都改成了“女性”。日本官方希望通过词语使用的改变来改变人们对女性的传统意识。

③ 源自 2014 年日本总理安倍晋三在“迎接女性绽放光彩的社会”国际论坛上的演讲。

④ 《VERY》是日本著名女性杂志，读者主要为专职主妇，刊行内容为时尚服饰、主妇才艺展示（手工、料理等）、育儿经验分享、生活小常识、家族旅行攻略等。每期都会任用多名主妇为杂志模特，杂志的生活感很强，从多方面展现日本家庭主妇丰富多彩的生活，深受日本女性尤其是专职主妇的喜欢。

会价值评价的内容。婚姻家庭的良好状态成为日本社会评价女性社会价值的先决条件，世俗所谓的美满家庭再加上 α 这一附加值共同达成女性“人生赢家”的条件。

二、日本对女性评价的历史演变

“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在本社会延续至今。虽然现在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一些女性能够积极参与到社会活动当中，但是“家庭是女性价值最重要的体现”仍然是对女性评价的主流。当今对女性“家庭角色（妻子、母亲）+ α >家庭角色（妻子、母亲）> α ”的次序性评价标准的形成存在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开始到现在大体经历了4个重要演变阶段。

1. 军国主义战争的工具

太平洋战争之前乃至战争期间，日本的主要产业结构是以农业和自营业为主，一般情况下女性与男性需要同时参加生产劳动。尤其是在战争期间，男性参军远征女性则需担负所有的生产劳动^[5]。同时，战争期间日本政府推行人口增加政策，宣传女性应该“结婚报国”“育儿报国”^①。在此历史阶段，日本女性在生产劳动与维持家庭方面都承担了主要的责任，当时的日本政府也给予战时女性“军国之母”“靖国之母”“经济战的战士”等荣誉称号^[6]。战时，政府要求士兵的妻子要做贞操管理，保持日本女性“妻子”“母亲”的神圣性，可是另一方却征召“从军慰安妇”，体现了对女性道德与价值的双重评价标准。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日本女性充当了为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的工具。

2. 不计报酬的职业——专职主妇

20世纪50~6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工薪阶层逐渐取代了农民和自营业主，日本女性也逐渐从农民的妻子、自营业主的老板娘转变为工薪族的妻子，继而出现了“专职主妇”。尤其在日本经济高度增长期的五六十年代，“主妇”占到已婚女性的绝大多数^[7]。对当时的女性来讲，操持家务意味着让现在的劳动力（丈夫）和未来的劳动力（子女）更好的体现价

值。由于操持家务是无需报酬的工作，也就是未被市场化的劳动，所以在这一时期“主妇”单纯被认为是女性的特定角色^[8]。有学者指出，日本女性尤其是那些专职主妇为日本经济的高度增长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正是因为专职主妇对于家庭的全力支持，使男性能够集中精力工作也使子女得到良好的照顾与家庭教育^[9]。

3. 女性“M”字型就业模式的形成

1970年—1990年，“M”字型就业模式形成体现了日本女性这一时期在家庭与工作之间迂回应对的特点。“M”型就业是指，日本女性在就业率上呈现两个高峰期和一个低谷期。学校毕业后（包括初、高等教育），女性的就业率出现了第一个高峰期。以结婚、生育、育儿等为主要原因，大多数日本女性辞去工作成为专职主妇使得女性的就业率出现了低谷期。直到育儿基本结束（子女上初中或高中），又迎来了第二个就业高峰期。

20世纪70~90年代，日本社会延续了战后“年功序列，终身雇佣”的劳动力聘用体制，同一年龄段的男性收入基本相同，专职主妇们的生活状况一般不会因配偶的经济差距有大的差异。“M”字型就业模式形成还与日本的税收与福利制度有密切关系。在日本的税收和保险制度之下，作为被扶养人的专职主妇与未成年子女可以在丈夫（父亲）的名下享受基本的社会福利（医疗、教育等）。如果夫妇同时工作，那么妻子要同丈夫一样需要单独缴纳收入所得税、健康保险等费用。另外，子女的保育费等费用的征收要依据家庭总收入的额度确定，家庭总收入越多需要缴纳的费用额度也越高。也就是说夫妇同时工作，收入增加的同时支出也在相应增加。而工作与家庭兼顾确实会给女性的生活带来很大的负担，综合利弊多数女性选择成为专职主妇显得合情合理。

4. 论女性“输赢”的时代

回顾日本社会发展历程可以知道，日本社会对女性的“赢家”“输家”评价始于21世纪初。也可以说当现代日本女性试图摆脱单一的家庭角色束缚

① 参考1941年日本人口政策确定要领。

的时候, 社会开始重新对女性价值进行评价。从上个世纪末开始, 由于日本泡沫经济瓦解, 劳动力雇佣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年功序列, 终身雇佣”体制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以效率和能力为主要雇用条件的劳动力市场化运作机制。这导致了日本男性社会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 同时非正规雇佣(临时工、合同工、派遣等雇佣形式)逐渐普遍化。这对日本家庭的影响是, 大量的家庭因男性收入减少而不足以维持家用, 女性为了帮助男性共同养家不得不走出家庭^[10]。山田昌宏根据日本总理府调查结果指出, 已婚家庭可以分为3类: 一类是夫妇共同劳动的家庭; 二类是丈夫工作——妻子为专职主妇的家庭; 三类是夫妇共同劳动——妻子低收入的家庭^[11]。这反映了日本男性社会雇佣的不稳定性导致了女性职业状态的多样化, 同时因配偶的经济收入状态不同致使女性所承担的压力和要面对的选择也不同。“家庭角色(妻子、母亲)+ α ”的女性“赢家”模式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产生了。 α 这个附加值是能够给女性带来物质或精神方面优越性的社会评价内容。

三、女性社会价值评价与女性自身

女性“赢家”更多是外在对女性社会价值的评价, 这个评价与女性自身的状况及感受是否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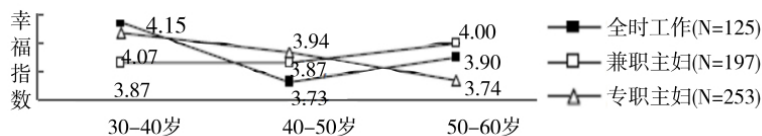


图1 日本已婚女性就业形态与幸福感相关分析

全时工作女性在组建家庭之初, 通过工作为自己带来较多的满足感, 当生育、育儿等家庭责任到来的时候她们不得不疲于应对工作与家庭双重重担, 所以在育儿期全时工作女性的幸福指数降为最低, 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育儿期结束后, 全职女性因家庭的负担减轻而幸福指数有所回升。兼职女性在组建家庭之初就需要在照顾家务之余从事兼职工作, 幸福指数显示为最低。当育儿期结束家庭责任减轻后她们的幸福指数成为三者中最高。专职主妇在组建家庭之初幸福指数高于兼职女性, 低于全

呢? 山田尤子曾经针对日本女性自身状态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 此处主要结合山田的研究结果从婚姻状态、职业状态、丈夫的经济收入、家庭关系等方面进行分析。

1. 婚姻状态

如同酒井顺子曾在《败犬哀嚎》一文中写到女人“无论人长的多漂亮、如何能干, 如果30岁以上、未婚无子, 可谓‘女人中的败犬’”一样, 目前日本社会能够接纳女性在社会上的成功, 但是如果是放弃了婚姻和家庭的成功却会被冷视。显然, 在日本社会如果“未婚无子”便不可能成为女性“赢家”。那么已婚女性就一定是人生“赢家”了吗? 按“输”“赢”的概率来讲, “赢家”至多参半, 或许在一个社会当中应该是少数人。那么, 关于谁是日本社会的女性“赢家”这一话题改为谁是日本社会已婚女性“赢家”也许更为恰当。

2. 职业状态

山田尤子依据日本 General Socail Survery < JGSS-2002 > 调查数据, 对575名30~60岁已婚日本女性的职业状态与幸福感进行了分析^[12]。30~60岁已婚女性的平均幸福指数分别为: 全时工作女性3.93, 兼职女性3.91, 专职主妇3.92, 结果表明职业状态与幸福感总体差距并不明显。但是从图1可以分辨出, 已婚女性的职业状态在不同年龄段给她们带来的幸福感是不同的。

时工作女性, 生育、育儿结束后, 生活似乎失去重心, 在50~60岁阶段幸福指数落入最低点。

山田在以上的数据分析中未能给出一个定论, 即已婚女性中哪种职业状态的女性可称得上人生“赢家”, 但是却从中给人很多启发。女性人生“赢家”的说法并不是一个恒定的评价, 不同年龄阶段和所需面对的家庭责任的轻重会使处于不同职业状态的已婚女性的幸福感存在较大差异。

3. 丈夫的经济收入

山田尤子进一步分析了已婚女性的幸福感与丈

夫年收入之间的关系（见图2）。结果表明，丈夫的年收入对已婚女性的幸福度有正影响。按日本工薪阶层收入水平来看，年收入350万日元属于中等偏上的收入阶层^①，也就是说如果丈夫的年收达到350万日元以上的话维持家庭开销基本不成问题。丈夫收入超过350万日元（约人民币24.5万元）的全时工作女性和兼职主妇会因丈夫的年收的积增

而幸福感提升。这一点可以理解为妻子的工作并非是为了帮助丈夫共同养家，而是为了提升生活质量、充实自身或自我价值实现。专职主妇的幸福感在丈夫年收入达到750万日元（约人民币52.5万元）以上积增时成正比例关系。可见，无论是全时工作女性、兼职主妇还是专职主妇，她们的幸福感都与丈夫的经济收入密切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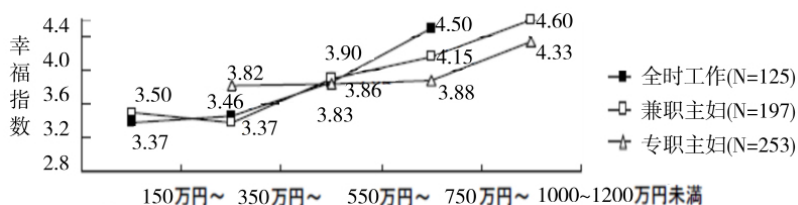


图2 已婚日本女性的幸福感与丈夫年收入的关系

4. 家庭关系

此外，已婚女性的幸福感又与家庭关系有密切联系（见图3）。比如，与婆婆同住的全时工作女性和兼职主妇的幸福感高于非与婆婆同住的女性，而专职主妇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可以说，无论是全时工作女性还是兼职主妇获得家庭支持会使她们因家务负担减轻而提升幸福感。

样化的特点。

人生“赢家”的说法原来只不过是社会依据对女性性别角色的期待进行的评价。“人生赢家”的社会评价更多注重女性主流价值观视域之下的价值体现，却忽略了女性实现被期待的价值时所承受的压力与负荷。“输赢”评判忽略了专职主妇在照顾家庭之外享有交友、余暇的快乐，也忽略了全时工作女性在家庭与工作兼顾的同时所付出的艰辛。另外，已婚女性的幸福感与丈夫经济收入的正相关关系也说明，女性的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很大程度上由配偶的收入程度所决定。女性的职业状态如何显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女性选择工作的动机是什么，是迫于生活的压力还是充实自身的方式等等，会使女性的幸福感完全不同。关于谁是日本社会的女性人生“赢家”这一议题，它不仅是日本社会生活中茶余饭后的谈论内容，其中隐含了现代日本社会对女性的评价标准，也就是“家庭角色（妻子、母亲）+α”的女性“赢家”模式。这一评价标准的形成原因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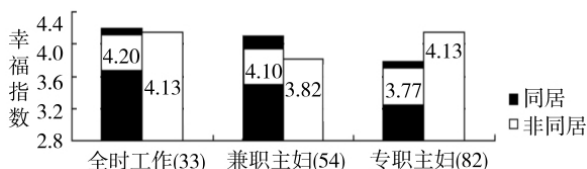


图3 已婚女性的生活满意度与婆婆是否同居的关系

四、总结与讨论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知道，婚姻家庭是日本社会评价女性社会价值的首要标准，而已婚女性的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不仅受到她们的职业状态（全时工作、兼职主妇、专职主妇）的影响，还与丈夫的经济收入水平、家庭关系（婆媳）等存在密切关系。日本社会对女性人生“赢家”的评价事实上更多是对女性在具备家庭角色属性之上，另外拥有的附加值的褒扬。这一评价既保留了对日本女性传统性别角色的认同又结合了当今日本社会女性社会角色多

1. 传统观念。“家庭角色（妻子、母亲）+α”的女性“赢家”模式糅合了现代社会对女性价值评价的主流思想。所谓日本现代女性价值评价的主流思想，就是认可女性在社会上的价值，但是对真正成功女性的评价首先应具备家庭角色实现。“男主

① 参考2014年日本国税厅发布的“民间工资收入实态统计调查”结果。

外, 女主内”、妻子和母亲是女性的天职等传统思想仍然对评价现代日本女性的社会价值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日本社会, 适龄非婚或者离异的女性似乎是与“赢家”无缘的。在对女性进行评价时, 婚姻家庭就像一个必不可少的光环。时代变了, 女性除了婚姻和家庭也可以在社会各个方面体现个人价值, 这是社会的进步。可是社会的进步和对女性价值的认同还无法摆脱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束缚。这种传统思想观念影响着社会对女性的评价, 也影响着女性自身处理家庭与工作关系时的想法与行为。

2. 社会因素。“年功序列、终身雇佣”的劳动力聘用体制瓦解使日本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男性社会首先出现“赢家”“输家”现象, 继此之后女性“赢家”“输家”的说法产生。现在日本社会对女性人生“赢家”的评价虽然包含了对女性在社会上价值体现的认可, 但是女性幸福感与丈夫收入成正相关的研究结果也说明女性的“输赢”与丈夫的“输赢”息息相关。近年来, 日本政府为了支持女性持续工作出台了很多便利政策。可是在2014年的时间点仍有60%的女性因为孩子的出生放弃工作。导致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可能有很多, 其中的一个可考因素就是, 日本的税收制度和保险制度对专职主妇是有利的。

综上所述, 关于谁是日本社会的女性“赢家”这一议题, 笔者认为日本社会存在“家庭角色(妻子、母亲)+ α ”这样一个对成功女性的评价模式。这一模式的形成受日本社会变迁、社会制度体系以及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说到底“赢家”“输家”也只不过是表面化的评价, 女性内在的幸福感或许更加能够表达女性的真实生活状态。并且, 笔者认为日本社会对女性“赢家”的评价表明了家庭角色实现是女性成功的首要条件, 其次才是女性社会性贡献及价值的内容。“干得好不如嫁的好”的说法在日本同样存在, 反映了女性对通过自身努力获得幸福或较好生活的无力感, 也反映了对男性主导的社会价值的认同。

中国社会似乎也存在对女性评价的性别角色先入倾向(比如恋爱、婚姻、生育等), 不过相比之下, 中国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评价相对宽容, 首先女性“赢家”“输家”的论调并不像日本社会那么普遍化和定性化; 其次中国女性参与社会的机会相对更多; 再次就是中国对“成功女性”的评价不像日本社会那样对家庭角色的实现要求那么苛刻。

[参 考 文 献]

- [1]酒井顺子. 败犬哀嚎[M]. 东京: 讲谈社, 2003: 7.
- [2]和田秀树. “输家”女人的胜利逆转术[M]. 东京: MAGAZINE HOUSE, 2005: 5-11.
- [3]铃木敦子. 从比较文化的视点分析性别角色[A]//社会心理学(论文集)Ⅲ. 东京: 垣内出版, 1997: 12.
- [4]上野千鹤子. 家父长制与资本制[M]. 东京: 岩波书店, 1990: 98.
- [5]天沼香. 日本史小百科近代一家庭[M]. 东京: 东京堂出版, 1997: 111-116.
- [6]牟田和惠. 作为战略的家族[M]. 东京: 新曜社, 1996: 9-28.
- [7]盐原秀子. 已婚女性的劳动[J]. 帝京经济学研究, 2005(38): 169-189.
- [8]梅棹忠夫. 妻无用论——妇人公论[J]. 中央公论新论, 1959(6): 2-3.
- [9]上野千鹤子. 社会性别与国家主义[M]. 东京: 青土社, 1998: 45-51.
- [10]落合惠美子. 致21世纪家族[M]. (新版) 东京: 有斐阁, 1997: 89.
- [11]山田昌宏. 家族与风险[M]. 东京: 劲草书房, 2001: 20-25.
- [12]山田尤子. “赢家·输家”论的真实——基于JGSS-2002数据关于幸福感规定因的分析[A]//日本版 General Socail Survery 研究论文集(6): 从JGSS看日本人的意识与行动. 大阪: 大阪商业大学比较地域研究所, 2007: 159.

[责任编辑 孙 丽]

Women's Social Value Evaluation and Gender Study ——Case Study of “Who Is the Women Achiever in Japanese Society”

LIU Cha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e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8,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evaluation criterion of female value in Japan based of the issue of “who is the women achiever in Japanese Society”. Japanese Society has a model of “family role (wife, mother) + a” to evaluate successful women. The paper explained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l and the gender issues in detail. The evaluation of Japanese Society for female achiever shows that the family role's realization is the priority in female success, and the secondary element is the value and contribution of women to society.

Key words: women's social value; Japanese women; achiever